

2007

中国年度最佳传记文学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ZHUANJI WENXUE



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杂志社 选编 蔡震 主编
漓江出版社

中国年度最佳传记文学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ZHUANJI WENXUE

传记文学

2001

《传记文学》杂志社

选编

蔡震

主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1 中国年度最佳传记文学 / 《传记文学》杂志社选编, 蔡震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1. 12
(年选系列)

I . 2... II . 蔡... III . 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306 号

2001 中国年度最佳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杂志社 选编
蔡 震 主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9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5407-2775-6/I · 1657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代序

关于传记文学的思考

蔡震

时下，无论期刊还是图书，人物传记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因为在一个不断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期，人们格外需要观照、思索自己所经历过和正在面对的人生。人物传记类读物显然是进行这种观照、思索最好的载体或对象。

人物传记是一种历史的叙述，传记文学是以文学的方式和语言进行这种叙述，能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出版工作者，相信也是读者所期望的。固然，人物传记读物也有消遣人生、娱乐人生的功用，所以那些翻炒名人，写名人逸闻、琐事，以人物经历编故事的文章，可以大行其道，但毕竟算不得传记文学的正道。不过，反过来，这也正让我们感觉好的传记文学作品还不够多。所以，谈到传记文学，我总念及文学二字。人们期望通过人物传记获得关于历史的描述，但并不想总是正襟危坐地去读一部史书、一篇史料，传记需要文学。我曾以此为题写过文章，也曾在电视采访节目中特别谈及这个问题。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很少涉足传记文学创作，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作品，已经多年未见了。

传记文学在题材上大概首先离不开名人，而名人，无论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似乎也总能引发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很正常。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名人自然为公众所瞩目。不过，人们关注名人，也表现为不同层面的精神需求。譬如：出于好奇心理，希望了解名人光环背后的故事；在名人的成长、经历、辉煌中寻

觅鼓动自己人生奋进的激情和勇气；从名人身上浓缩的风云际会，去真切体味时代的大千世相。我想，一篇好的名人传记，应该包含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鲜明的人文精神，以充分满足读者多层面的精神需求、审美需求。本书收入的《一同走过——杨宪益与戴乃迭》的作者一直从事人物传记的创作，他以学者的见地、作家的文才，把从两个不同国度走到一起的两位文化名人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人生精确、有力地表现出来。《回忆父亲董希文》以女儿刻骨铭心的几组速写式的场景，刻画了董希文在生命的艰难时刻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音乐流淌过她全身——享誉世界的女指挥家郑小瑛》、《面人汤——汤子博》、《叶至诚：一生为人至诚》等作品，都是这样饱满、充实，富有表现力，启迪人感悟的佳作。

然而，毋庸讳言，炒作名人的东西依然不少。虽然出版物（包括报刊）的“名人热”似呈下降趋势，但大大小小报刊上“过日子”、“生孩子”之类的名人琐事、逸闻还是层出不穷，不断翻炒冷饭者也大有人在。相信总有倒了读者胃口的时候。事实上，这两年以来，普通入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成功挫折，渐渐引起人们更多的阅读兴趣。这应该说是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个好势头。这里选入的《悠悠读书情——下乡的日子》、《我在大哈达的灰色岁月》等作品，就是普通人写自己的生活，写给千千万万与他们可能有着同样经历和体验的人看的。

正如一位作者所言：“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行旅中总会留下一些值得回忆、回味的东西；一曲辉煌、一段曲折、一股温馨、一丝苦涩……它们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记述了一种曾有过的生存状态。岁月风霜，刻下万千世相的点点屐痕。”这点点屐痕，你有，我有，他有，有人写了下来，自然会激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与心灵上的交流。这些文章在风格上，大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语言平易、质朴，叙事舒展、流畅，富于抒情色彩，是不错的散文作品。

人物传记既然是关于历史的叙述，就有一个历史真实性的问

题,显然,它不同于文学的真实性,至少人物、事件不能虚构、想象。有些传记作品,称作“传奇”、“故事”,完全是文学的形式、笔法,我以为应该归在通俗小说一类,传记文学还是需要强调纪实的特性。《蛇医专家季德胜的悲欢人生》、《创造神奇的“手”》中传主的经历,都富有传奇的色彩,作者为我们创作的文本,也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但是,它们立足于传主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所以读来格外感人。而且惟其如此,我们在阅读中才能切实地感觉到文章是如此贴近了现实人生。

许多传记文学作品在叙事、描写中,包含了珍贵的史料价值,这是它们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又一独特之处。像《裘劭恒亲历东京审判》,通过传主的亲历亲见,记录下那一次大审判鲜为人知的资料。《一位军官的传奇人生》,从被时间湮没尘封了的一个老人的记忆里,披露出从未见诸史料记载的史实。一次事件、一个人物、一段经历,都能作为传记文学创作很好的题材。这样的作品可以钩沉史迹,补正史阙;既能为文史学家们参考,又可使一般读者由此触摸历史的脉搏,感受历史的进程。从来能够进入正史的人物、事件都是有限的,所以正史之外总有无数的野史、笔记之类,这无疑是传记文学驰骋的巨大空间。但也应该看到,尽管这样的传记作品数量很大,而称得上文学性、史料性俱佳者,毕竟还不算多,也不尽如人意,许多作品或许更近于文史资料。

由当事者写自己人生的回忆,是一桩有趣也极有意义的事,它让历史记忆中的人、事变得更丰满,更鲜活。《延安生活散忆》里是一些人们熟知的名字:朱德、胡耀邦、野坂参三、马海德,虽然作者只写下一个孩子眼中看到的件件小事,却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抗战时期延安生活的风貌。《我的良师益友》的作者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了一生,他记录下沙汀、李季、张光年、冯牧等一个个曾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的音容笑貌。《凌子风:我的家》是凌子风生前所写自传中的一段,只是一种平实、流畅的自述。但传主作为一个具

有丰富而独特经历的文化人、电影人，他身上差不多就浓缩了新中国电影史的一面。郭沫若在撰写他那几部著名的自传时，曾写下两句话：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人。”我“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正是这些自传性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时代、一个个时代的侧影。

历史无论对于谁，多少都是显得有些凝重的话题，所以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更愿意关注现实中的人物，或是人物现在时态的活动。如果不局限于某一种刊物，而从整个传记类刊物的范围看，这类题材恐怕也是数量相当大的。客观地讲，我觉得大量这类题材的文章，很难称其为文学性的传记作品。它们缺少较为厚重的文化意蕴，缺少文学的元素，也缺少作者深入进去的思考；因而显得浮躁，似乎只传达了某些信息，像一般新闻性的人物通讯、报道的写法。不过，这之中确实也存在一个使人困惑的矛盾：历史与流行，严肃与通俗。传记文学从其本性上应该具有历史和文学意义上的严肃、庄重，但作为大众期刊的作品，它也应该满足轻松、愉悦、时尚这样的阅读心理需求。在这两者之间把握到契合点，当然还是需要努力的事。《苏童：文坛灵童》、《作家陈村和女儿的故事》能在轻灵、睿智、诙谐的叙述和充溢着时尚生活气息的描写中，凸现当红作家富有个性特征的剪影，是值得称道的。

回首一年的传记文学创作，是作者、编者伴随读者一同走过的，有欣慰，亦有感慨。漓江出版社的同志在今年夏季与我谈起年末编选一个集子，原意是要从各个报刊上精选作品，但时间上、操作上似觉仓促，更主要的是，传记文学创作并没有一个选刊在做日常积累性的工作，所以，我为《传记文学》编选了这样一个集子。不管怎么说，漓江出版社做的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这让我们在回顾既往时认真思考着下一年。

目 录

代序 关于传记文学的思考 蔡 震(1)

一同走过

——杨宪益与戴乃迭 李 辉(1)

回忆父亲董希文 董一沙(30)

我的良师益友 束沛德(36)

冰心爱猫记 张 斌(49)

凌子风:我的家 凌丽整理(53)

鲁迅与梵澄 甘竞存(66)

沉香屑

——张爱玲和她的美国丈夫 于 青(74)

两三松树老疑仙

——新民报史上的“三张一赵” 徐 迅(88)

延安生活散忆 王 恒(101)

裴劭恒亲历东京审判 马龄国(110)

像两股轻烟绸缪在一起

——卜少夫与徐天白的生死恋 李 伟(119)

顾维钧的一段情感历程 沈 潜(128)

张竞生:二十世纪初的“性博士” 刘 勇(141)

面人汤

——汤子博 嘉 霖(152)

蛇医专家季德胜的悲欢人生	祖丁远(168)
一位军官的传奇人生	刘水 儒德(187)
图们将军	陈晓东(197)
创造神奇的“手”	郝敬堂(207)
一对美国“老乡”的中国情缘	
——阳早与寒春	聂 冷(219)
我所认识的黄钢	马尚瑞(229)
隔世的交流	
——路大荒与聊斋	王小鲁(237)
叶至诚:一生为人至诚	黄东成(246)
音乐流淌过她全身	
——享誉世界的女指挥家郑小瑛	杨 荔(259)
文坛“老农”	崔金生(275)
“画痴”张守义	耀 世(283)
悠悠读书情	
——下乡的日子	皖 生(287)
舞蹈皇后戴爱莲	茹 子(295)
写信带来的灾难	
——怀念缪平	谷斯涌(301)
我在大哈达的灰色岁月	邓乃刚(308)
爱恨交织的初恋	慧 春(316)
苏童:文坛灵童	张宗刚(325)
作家陈村和女儿的故事	韬 之(333)
杨澜:风中步履	张建安(343)
“神人”马未都	李 霞(348)
张国立:“皇帝”本是铁路工	林道远(356)

一同走过 ——杨宪益与戴乃迭

李 辉

引 子

这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共同的故事。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Gladys)。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行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

力融进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中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经历。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杨宪益与戴乃迭却因此而遭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五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的时候，惟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他们却坚强地生存着，一同播种，一同收获，一同走过快乐与痛苦。

1

1938 年的英国。

母亲惊住了：刚刚 20 岁的女儿，竟然爱上了中国留学生。

尽管战争的影子越来越浓重，但二战大幕尚未拉开，伦敦还显得一片平静。人们按部就班地生活，天灰蒙蒙的，湿漉漉的天气让人难受，却也无奈。

在当时的英国，对于身为传教士的母亲来说，女儿戴乃迭的选择，实在有点儿出乎意料。

“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母亲这样严肃地警告说。

母亲有她的忧虑。她和丈夫一同到中国传教，在那里生儿育女，那里的一切她都不陌生，甚至非常熟悉。对她这位传统的英国女人来说，向中国人传教，与把女儿嫁给中国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她太清楚不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她更了解彼此之间在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强烈反

差。这就难怪她会难以接受女儿的这一决定，她为女儿的未来而担忧。

戴乃迭一生中，与母亲的这次对话，实在是决定未来命运的时刻。

她不愿意改变自己。她相信最终会说服母亲。等到了 21 岁这个法定的独立自主的年龄，她便可以与自己爱的人订婚，哪怕他是一个中国人。当她做出最后的决定时，她便把自己的命运紧紧与爱人的命运连在一起，与爱人的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半个多世纪后戴乃迭这样说。此时，她已经在中国有过诸般经历，战乱、革命、破坏、建设，风风雨雨，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文革期间蒙受牢狱之灾，儿子因文革而自杀，这样一些意想不到的磨难，令她在回忆母亲当年的警告时，心底难免会掠过一阵苦涩。

然而，她镇静，她无悔，她还是充满自信。因为，她爱中国古代文化，她爱中国的一个个好朋友，她爱她选择的终生伴侣——杨宪益。是他在漫长日子里带给她快乐与温馨。对于她来说，情感与精神上的满足，远远超过一切。为杨宪益，她愿意也能够承受一切。

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后代，戴乃迭仿佛注定要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 20 世纪与中国有关的外国人中，传教士的后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随父母在中国长大，后来有的离开了，有的留下了。无论走了的，还是留下的，他们未来的发展和命运注定要与中国有关。如人们熟知的：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

约翰·戴维斯，盟军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罗斯，《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细细搜集，几乎在中国的所有领域，特别是政治、教育、文化、工业、商业等方面，都不难找到传教士们的后代，那一定会是一长串耀眼的名字。

和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相比，戴乃迭当然显得平凡而普通。她始终对政治不感兴趣，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永远在政治上显得幼稚。她不习惯于做抛头露面风光十足的公众人物，只愿意平静地与丈夫呆在一起，专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在精神的满足中愉快走着。因为，最终把她和中国联系起来的，是对杨宪益的爱，是对童年的北京生活美好而甜蜜的记忆。

的确，如果没有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很难说她在牛津大学念书时，会对抗战中的中国充满同情，参加中国协会的工作。这样，她也就不会接触到担任协会会长的杨宪益，后来的一切大概也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和母亲相比，童年时期的戴乃迭，对中国和北京的感受是迥然不同的。那是色彩丰富、情趣盎然的日子。

戴乃迭 1919 年在北京出生。她的父亲 J.B. 泰勒 (Tayler, 中文名字戴乐仁)，受伦敦传教会派遣在中国工作，负责救灾援助和庚子赔款的使用。戴乃迭出生后的中国正处在战乱之中，社会充满危机，也充满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戴乃迭回忆，他们家认识的一个传教士便被土匪杀死。她的父亲有两块手表，一块好的金表平常在北京时戴，另一块欧米迦表在旅行时戴，于是，孩子们便把这块欧米迦表叫做“爸爸的土匪表”。不过，对这些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孩子们来说，并没有感觉到中国的危机，在他们的感觉中，生活平静而快乐。

戴乃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留在戴乃迭童年记忆中的北京，色彩丰富，充满生活乐趣，在她的眼里，一切都那么新

鲜而生动。店肆幌子、婚葬队伍、灯笼、风筝、厂甸的春节庙会，令人目不暇给，热闹非凡。在庙会上，花几个铜板，就能买到许多好玩的玩具。有钱人坐轿子或者坐经过精心打扮过的人力车，同时还有运煤的骆驼队穿街而过。最让人难忘的是当街宰羊，看着被宰的羊的血汨汨地流，她既感到害怕也颇为兴奋。一切都值得回想。用戴乃迭自己的话来说：“甚至可怕的沙尘暴也像是充满着戏剧性。”

在戴乃迭的记忆中，这座城市尽管有些地方泛着恶臭，但这并不妨碍戴乃迭对街边小摊产生兴趣，那些沿街叫卖者挑着的火炉里，总是散发出十分诱人的味道。母亲不喜欢中国食物，认为它们不卫生，她安排孩子们吃的都是英国羊肉和大米布丁，偶尔才允许吃一顿饺子。但戴乃迭和几个哥哥和姐姐，常常背着母亲，请厨师或者车夫，帮他们弄来烙饼和夹葱煎饼，他们觉得好吃极了。

戴乃迭的家住在抽屉胡同的一个老四合院里。他们这些孩子在院子里养兔子，在小花园里种棉花。一年从北戴河度假回来，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棉花全绽开了，园子里一片白，真像下了雪一样。院子里还有一个大沙堆。父亲为他们买来一辆自行车。戴乃迭便和姐姐比赛。看谁第一个能从沙堆上面冲到门廊里，结果是戴乃迭赢了。几十年后，年近八十的她，还这样说：“我至今仍能回想起获胜的感受。”

让戴乃迭感到遗憾的是，她不能像别的在中国长大的外国孩子那样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她的母亲不允许孩子们和中国孩子一起玩。母亲把孩子关在家里玩耍。后来父亲到燕京大学教经济学，全家从城里搬到海淀，在那里和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老师们的孩子一起玩，即使遇到一些中国人，他们也大都讲英语。

家里请有中国保姆，但和她之间，孩子们也并非可以随便往来，因为家里还有一位英国老处女监护着他们。这位老处女本来希望到中国来当传教士，但她的条件不够，便由伦敦传教会派她来

帮助料理像戴乃迭父母这样夫妻都是传教士的大家庭。这位老处女把他们监管得十分严厉。每天要看他们把牙刷完,要教他们学几段《圣经》,还要监督女孩子练习做针线活和画画。到北戴河避暑则是孩子们快乐的时刻。在戴乃迭印象中,它简直称得上一次大行军:

我们带上两个用人,猫,冰淇淋机以及大量日用品。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只是一个小村庄,没有什么商店。许多新教传教士团体都在那里有别墅,女人和孩子们夏天前去避暑——有时我们在那里住上三个月。快乐极了。在完成功课之后,我们光着脚跑到海滩上玩游戏,或者骑驴,或者在野外赛跑。我们中的英雄之一是 Erie Liddell,他那时在天津中英学校教书,也正是我丈夫念过书的学校。电影《烈火战车》描述他如何赢得奥运会长跑奖牌的故事。这位可亲可爱的叔叔和 Hilda 在沙滩上赛跑。当英国国旗在我们家花园里的旗杆上升起来时,我们知道该是回家吃饭的时候了。

这便是中国留给童年戴乃迭的美好记忆。她亲身感受到的快乐,亲眼目睹的丰富色彩,使她从感情上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天早上,戴乃迭和姐姐 Hilda 如通常一样到清华大学附属的一个国际幼儿园去。路上很脏,不是灰就是泥泞。两个女孩骑着脚踏车,姐姐骑的是“仙童牌”自行车,戴乃迭骑的是三个轮子的脚踏车。突然,一群逃兵把他们团团围住。他们并无恶意,用戴乃迭自己的话说,他们只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外国孩子骑这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感到好奇而已。他们很友好地问她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们也一点儿不害怕,因为中国人对她们从来都很友好。逃兵的围观使她们迟到了,这件事被告到母亲那里,她顿时吓坏

了：中国军阀的队伍居然拦截她的女儿。

本来母亲计划让孩子在中国多住几年，戴乃迭姐妹的这次“历险”，让她改变了主意。她当即着手安排她们回国。1926年，她们乘坐轮船离开了中国。这时戴乃迭七岁。

航行悠闲而愉快。但第一眼看到伦敦，戴乃迭却甚感失望。天灰蒙蒙的，潮湿得很，到处都是汽油味，根本没有她所热爱的北京色彩丰富、活泼多姿的街景，也没有诱人的味道。

中国在遥远的身后。快乐的童年也永远消失了。但是，戴乃迭再也不会忘记中国。这样一种童年时期形成的感情，注定会决定她未来的生活道路的选择。中国发生的一切，在后来的一年年日子里，仍然吸引着她。不仅仅因为父母还在中国工作，而是她更从心底向往之。

3

中国在动荡中。中国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着。1937年，当戴乃迭走进牛津大学校园时，她再度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此时，距离她离开中国已整整十年。

说实话，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戴乃迭只是好奇地注意到，面前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眼睛细细的，一脸苍白，举止文绉绉，人显得颇有些拘泥。不过，戴乃迭说，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当她到杨宪益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杨宪益自己画的一张中国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地图。

戴乃迭结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确与众不同。他懒散、贪玩、调皮，似乎诸事漫不经心，但他却又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竹林七贤恐怕是他最为倾慕的先贤。在戴乃迭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中，大概只有他身上最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喜欢收藏字

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这就难怪戴乃迭爱上了他。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虽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在戴乃迭眼里,两者之间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在他们结婚之后的漫长日子里,杨宪益身上的这一特点愈加突出,戴乃迭可以为自己的直觉和选择而满足。

杨宪益出生在天津家境优裕的杨家。祖父杨士燮,共有兄弟八个,其中四位在晚清时做过翰林。祖父曾在淮安做过几年知府。父亲在民国时期担任在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同时还兼金城银行的行长。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出国留学并非难事。何况祖父属于思想开明的官员,从他那时起就开始送孩子出国留学。杨宪益的父亲留学日本,五叔留学法国,六叔留学德国,另外还有一个叔叔留学美国。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杨宪益从小有父母宠爱,算得上一个被娇惯了的孩子。他身上的那些习性,懒散也好,顽皮也好,兴趣广泛也好,实际上都与他在家庭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有关。

杨宪益回忆童年时说:

家里比较娇惯我,不过,调皮也不算太调皮。我小的时候,我妹妹夏天都到北戴河去玩,可我因为是独生子,他们不放心,说是到海边危险,北戴河不让我去。我要学骑车,结果也说不行。两个轮儿的觉得太危险,容易摔跤,给我买了三个轮的自行车,前面一个轮,后面两个轮,结果说还不放心,还怕我摔跤,又给我加两个小轮子,变成五个轮子的自行车,没见过吧。因此,自行车也没学会,游泳也没学会。

说到童年的活,杨宪益总是有一些颇为得意的“壮举”: